

【青年社会参与】

# 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

杨江华 杨思宇

**【摘要】**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相关数据,分析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及其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根据“连接”结构差异,可以将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划分为独立型、常规型和丰富型:其中,独立型和常规型圈群特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年中更为明显,丰富型圈群特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中更为明显。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青年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与独立型和常规型圈群特征的青年相比,丰富型圈群特征的青年在政策参与和表达参与方面更为积极;在维权参与方面,则出现了在低社会经济地位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间的“两级分化”现象。研究发现为理解互联网与青年政治参与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实证依据。

**【关键词】**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杨江华,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杨思宇,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出处】**《青年研究》(京),2023.5.45~55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流动空间视角下的网络公民参与研究”(20BSH149)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sup>①</sup>高质量的政治参与对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网络社会的崛起不仅推动了社交场域的“虚实转换”,同时也带来政治参与的转变。

近年来,关注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成为重要议题。既有研究形成“负向削弱论”和“正向促进论”两大争议观点。其中,“负向削弱论”认为,互联网使用挤占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导致社会资本下降、政治注意力分散,进而引发“政治冷漠”(Putnam, 1995);“正向促进论”关注互联网使用的正向作用,认为网络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社会“连接”,提供了新的公共参与途径和交往空间,促进了信息流动,为提升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契机(王薪喜、孟天广, 2021)。

上述两大观点相互对立,但在分析思路却具有一致性。它们均从媒介技术特征的视角讨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关注“是否使用”互联网、“使

用了什么”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部分研究还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因果论证(陈云松, 2013)。不过,这些研究基本上忽略了从网络空间中社会关系特征的视角考察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尤其对青年来说,他们并不存在明显的“接入沟”差异<sup>②</sup>,在互联网使用上具有更强的“社交化”属性,多元化的圈群关系已成为青年网络社交的主要特征(王阳、张攀, 2018)。

探讨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这既是对经典社会学关于“群聚连结”议题的承接,也是对网络社会中社群关系新特征的关注。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主要场域;人们的网络连接形式不断丰富,交往实践形态不断变化,其中网络社交的“圈群”现象成为主要趋势(彭兰, 2019)。

青年是网络空间中最为活跃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参与方面,青年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不过,与现实中的参与程序和宏大叙事相比,他们更愿意在网络社交平台上进

行“个性化表达”(田丰,2020)。由此,网络圈群和政治参与间的关系成为本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

此外,既有研究在“正向促进论”的基础上延伸出“条件强化论”,认为互联网“赋能效应”只发生在特定人群身上,社会不平等是造成赋能差异的主要原因(陈华珊,2015)。同时,不平等也是理解“数字化”的重要因素(Campbell,2009)。在网络社交“圈群化”的背景下,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差异是否仍嵌入在社会不平等结构中,并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这是本研究探究的另一个问题。

本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相关数据,探讨青年社交的圈层特征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两者间关系的异质性作用。

##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 (一)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政治参与内涵丰富,既包括既定政策框架内的“制度性参与”,也包括具有较强冲突意味的“非制度性参与”(陈云松,2013)。胡荣(2008)根据制度化程度和主动性强弱,将政治参与划分为人大选举参与、利益表达参与和维权抗争参与三种主要类型。

不论哪种类型,政治参与都是加强公民与国家联系、提升公民对政府了解的重要方式。公民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政治权利的体现,也是现代民主的重要特征(金桥,2012)。互联网提供了更丰富的参与渠道,但也给个体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互联网既是“赋权工具”,也可能“挤占”社会公共空间(郑永年,2014)。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究竟如何成为争论焦点。

有关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既有研究主要形成三种观点。<sup>③</sup>

第一种观点为“负向削弱论”。帕特南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大众传媒的普及导致人们花更多时间观看电视节目而不是参与公共生活(Putnam, 1995)。帕特南的这一思路被“延伸”到对互联网影响的讨论上,被归纳为“时间替代假说”(Schemer et al., 2021)。该假说认为,互联网“侵占”实体空间中的社会交往,削弱人们面对面交往的频率,进而导致社会资本下降。此外,互联网中过于庞杂的信息

会分散人们的政治注意力,对政治参与产生负向影响(Gentzkow, 2006)。

第二种观点为“正向促进论”。“正向促进论”认为,互联网重塑了时空机制,不仅能提升个体参与程度,还能将原本不参与的人纳入政治参与中。一方面,互联网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数量,大量密集的政治信息接触有利于提升公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效能感(Tolbert & McNeal, 2003);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可及性增加了公民自我表达和政治讨论的机会,为公民提供了更丰富的政治参与渠道(Baumgartner & Morris, 2010)。此外,随着直播平台的兴起,网络“泛娱乐化”现象也引发关注。但已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娱乐性使用实际上并不会削弱人们的政治参与(林奇富、殷昊, 2020; 孟利艳, 2022)。

第三种观点为“条件强化论”。基于对“正向促进论”的修正,“条件强化论”纳入结构性视角,认为数字赋权效应存在“群体选择性”,并指出其中存在三个主要原因:其一,数字鸿沟塑造了“信息鸿沟”,缺乏互联网技能的人很难处理大量信息。其二,使用偏好导致赋能差异。例如,在电视上观看新闻和观看娱乐节目产生不同效果,前者会激发人们的政治效能感而后者不能。其三,互联网激活的是具有参与意愿的群体,由于人们有选择地筛选网络信息,因此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的群体很难受到影响(Schlozman et al., 2010)。

在现阶段研究中,“正向促进论”获得更多支持。但相关研究大多限于媒介技术特征的视角,根据“是否使用互联网”“使用了哪些功能”“使用的频率程度”等进行分析,忽略了互联网的连接性本质。相比之下,随着数字接入鸿沟的逐渐弥合,个体的网络连接形态更需要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强了社会联系;随着“虚实空间”界限的模糊,人们基于各类纽带在网络空间中进行联系,形成又一个“圈群”(李彪, 2014; 彭兰, 2019)。面对社会“连接”的新变化,需引入新的视角考察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此外,“条件强化论”的观点为更深层次理解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条件强化论”关注由社会地位结构差异引发的“数字化”。

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成员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成员在数字技能与素养上均占明显优势(Hargittai & Hinnant, 2008);在政治参与方面,他们也更具主动性(Brundidge, 2010)。因此,在分析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时,不能忽视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造成的影响异质性。

## (二)网络圈群及其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网络圈群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产生出的群聚联结新模式,对网络社群聚特征的讨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而不断深化。在网络社会发展初期,“网络社区”是关注的现象。网络社区具有较为明确的空间指向:互联网提供了跨越时空的交往方式,个体可以在网络空间中建立新的社会“连接”,由此也催生出“社区解放论”的观点(Wellman, 2018)。但是,网络社区更多是宏观层面的分析,同一社区不同群体间仍具有不同的“连接”强度和交往方式,由此后续研究又将分析重点延伸到“网络社群”和“网络圈子”方面。具体来说,网络社群是指特定网络空间中进行互动交往的群体,群体成员间有较强的情感联系;网络圈子是指围绕某种联系纽带(如兴趣、情感或利益等)而产生的人群聚集,内部具有较为明确的权力结构(张文宏, 2011; 彭兰, 2020b)。

既有研究更关注特定的、具有代表性的群聚联结,较少从全局视角考虑网络连接的多样性。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个体具有建构和管理圈子的自主性,在不同社交平台上,个体的关系得到重塑与拓展,各类网络圈子相互叠加与嵌套,形成不同“网络圈群”(李彪, 2014; 阎国华、闫晨, 2021)。“网络圈群”概念是对既有“网络圈子”概念的补充与拓展,体现了个体“连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网络圈层”特征可以基于圈群的生成路径进行理解,具体涉及空间、资本和结构三个维度,空间转换与资本重塑是“圈”化的重要基础,而不平等的结构则是形塑“层”化的关键力量。

首先,空间维度体现了社交场域的“虚实转换”。网络社交平台的多样化发展使个体能够充分根据主观能动性构建和管理自身的网络圈群。一方面,现实世界中的关系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复制,由此实体空间中的联系在网络空间中得以延续;另一方

面,互联网为新联系的建立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个体可以选择在不同平台进入不同网络圈群(匡文波, 2020)。

其次,基于社会资本维度,可以判断不同“连接”状态的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基于“连接”异质性,帕特南区分了“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性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前者主要是基于“强连接”纽带而获得的社会资本,后者主要是基于“弱连接”纽带而获得的社会资本(Putnam et al., 1993)。网络社交平台具有强大连接能力,既可以形成围绕亲朋好友组建的“粘合性圈群”,也可以形成基于同学、同乡或兴趣等“弱连接”纽带,以及匿名的以内容、文化或产品等“泛连接”纽带建立起来的“桥接性圈群”(王友良, 2022)。

根据对传统现实关系的研究,个体从“强连接”处能够获得更多情感支持,从“弱连接”和“泛连接”处能够获得更多信息以及资源回报。但是,在网络空间中,个体有能力对圈群重新进行“定义”,“强连接”的情感功能可能受到弱化,“弱连接”和“泛连接”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效用(彭兰, 2019)。

最后,互联网给予个体形成网络圈群的自主性,但网络空间中的关系建立同样受到现实中等级差序的束缚。“圈层化”是网络社会的新现象。从语义上看,“圈”化与“层”化表示人群的聚合与分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个体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受到现实阶层的限制,因此这种将“圈”与“层”并行讨论的说法其实并不冲突(彭兰, 2020a)。阶层差异导致“数字鸿沟”,互联网的普及并不意味着“数字鸿沟”的消失,其形式可能转换为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互联网使用差异,阶层较高的网民通常拥有较好的数字技能与素养,会开辟出更多的网络活动空间。此外,在空间流动性不断加强的背景下,较高阶层的网民能够将现实空间中的社会资本转移到虚拟空间中,在虚拟空间中继续保有更丰富的“连接”,即现实阶层差异会在虚拟空间中得到复制。不过,关于“圈层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探索和现象描述上。因此,利用大规模公开数据进行相关经验研究十分必要。

随着互联网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网络

“圈群化”社交成为理解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切入点。一方面,既有研究大多围绕特定的“网络圈子”进行分析,忽略了青年在网络世界中连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网络圈群”进行分析,可以同时捕捉到关系的“虚实同构”以及“连接”的特征差异,从而更加细致地揭示互联网与政治参与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网络圈群成为理解社会分层的新视角,能够作为新的结构因素去探究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目前“条件强化论”更多关注个体禀赋的异质性而忽略了“连接”关系的结构性,圈群视角可以对既有研究形成有益补充。此外,从政治参与方面看,由于政治参与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为更精细地了解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对多种政治参与进行对比和讨论十分必要。

### (三)研究思路

网络社交“圈层化”影响人们的信息接触和思维行动,进而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围绕以下两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中国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不同圈群特征的青年在不同维度的政治参与上表现如何?

基于相关调查数据,本研究对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进行分类。既有研究对“网络圈子”的类型划分相对深入,但对“网络圈群”的特征判断相对缺乏。潜在类别分析可以将多元的圈群关系重组为网络圈群特征的类别变量,有利于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针对政治参与的丰富内涵,本研究将依据规范性和主动性对政治参与进行多维度分析,以揭示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的复杂关系。

此外,网络平台“去中心化”特征以及网络社会的空间流动性,曾经让“正向促进论者”看到互联网突破“阶层分化”的希望。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发现数字不平等其实嵌入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中,形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基于此,本研究试图将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纳入实证分析,以期回答另外两个问题: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是否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存在差异?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是否受到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异质性影响?

##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连续性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调查内容不仅包括个体的基本信息、政治参与状况,还详细了解个体加入网络社交群的具体情况,符合本研究的需求。

本研究的对象为青年。参考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对青年的定义(14—35周岁)<sup>④</sup>,同时考虑样本的结构特征,保留年龄在18—34岁的样本。2021年的CSS共收集10136个样本,其中青年样本为2491个,删除没有上网经历和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1982个有效样本。

### (二)变量

#### 1. 因变量

因变量为政治参与。借鉴已有研究(陈云松,2013;胡荣,2008;王薪喜、孟天广,2021),将政治参与分为“政策参与”“表达参与”与“维权参与”三个主要方面。其中,“政策参与”是指通过政府鼓励的、自上而下的渠道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参与”是指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维权参与”是指通过制度外的渠道和方式,自下而上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在因变量测量的具体操作上,本研究采用“是否参加所在村/居最近一次的社区居委会/村委会选举或所在县/市一级的人大代表选举”,最近两年是否“利用专业知识参与公共政策、公共事务论证会”“出席政府部门组织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听证会”“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测量青年政治参与中的政策参与;采用最近两年是否“与他人或网友讨论政治问题”“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公布的政策发表个人意见”测量青年政治参与中的表达参与;采用最近两年是否“到政府部门上访”“参加线上/线下集体性维权活动”测量青年政治参与中的维权参与。可以看出,这些测量项目基本上涵盖

了现实情境中青年政治参与的主要内容。

根据是否参与,分别取值为1或0。将上述变量分别纳入项目反应理论<sup>⑤</sup>模型中,预测不同类型的“潜在参与”指数,取值范围标准化为0—1。

## 2. 自变量

自变量为网络社交圈群特征。CSS2021询问受访者“近两年来,您加入了以下哪些网上社交群/圈?”选项包括10种类型,分别为“亲人亲戚之间的社交群”“朋友之间的社交群”“同事群”“邻居之间的社交群”“同乡群”“同学、校友群”“兴趣群”“公益社团群”“行业/同行/协会群”“宗教信仰群”。

根据是否加入,分别取值为1或0。本研究基于类型学视角考察青年网民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具体来说,根据问卷中相关题目,通过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分析青年不同圈群的条件概率分布,归纳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的主要潜在类别。

##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民族(汉族=1,其他=0)、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户籍状况(农业户口=1,其他=0)、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工作状态(有工作=1,无工作=2,学生=3)、家庭年收入(取对数,原单位:元)、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上/中上=1,中/中下/下=0)以及所在省份(东部=1,中部=2,西部=3),等等。

## (三)方法

通过LCA方法,识别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的基本类型,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网络社交圈

群的特征差异;分析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

个体圈群特征差异不具有随机性,因此本研究选择通过增强逆概率加权(Augmented Inverse-Probability Weighting, AIPW)倾向值分析建立实证计量策略。AIPW在反事实框架下通过加权倾向值匹配进行分析,能获得比传统倾向值匹配更稳健的估计值,有利于对实证结果的解释力进行校验。

## 三、主要研究发现

本研究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相关数据,首先探讨青年社交的圈层特征;其次探讨青年社交的圈层特征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关注以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结构因素对两者间关系的异质性作用。

### (一)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

#### 1. 网络社交圈群特征的基本类型

使用LCA需要事先确定划分类型的数目。对数据进行多次拟合,最终确定潜在类别的最佳数目为3个(见图1)。<sup>⑥</sup>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三种潜在类别间具有较强异质性。依据圈群特征,为三种潜在类别分别命名(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圈群类型属于“独立型”的青年网络圈群“连接”最少,他们往往较少加入社交群聊,圈群参与度较低;圈群类型属于“常规型”的青年更多加入亲人群、朋友群等“粘性圈群”,对兴趣群、社团群等“桥接性圈群”的参与度较低,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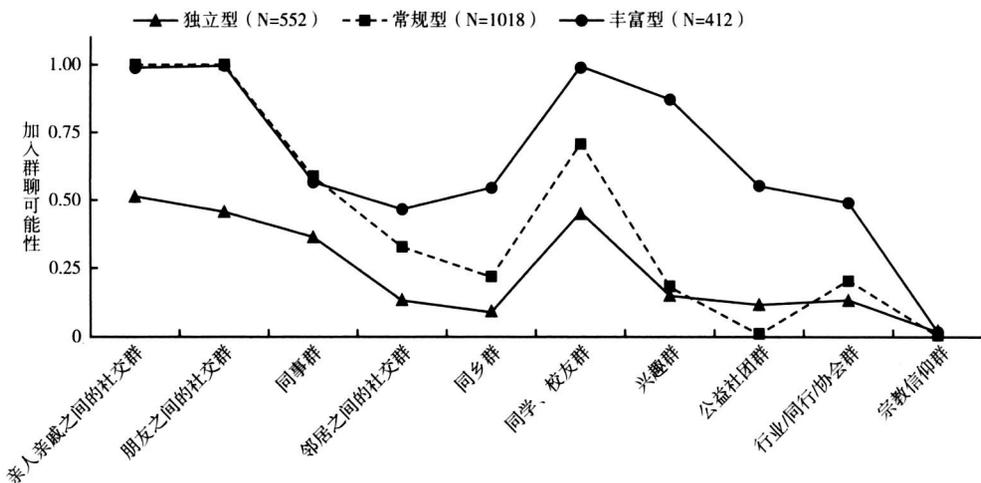


图1 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的基本类型

表1 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类型的具体特征

类型	总参与度	粘性圈群(亲人群、朋友群等)	桥接性圈群(兴趣群、社团群等)	占比(%)
独立型	低	少	少	27.85
常规型	中	多	少	51.36
丰富型	高	多	多	20.79

体圈群参与度介于“独立型”和“丰富型”之间;圈群类型属于“丰富型”的青年网络圈群参与度较高,他们不仅加入更多“粘性圈群”,同时也更多加入“桥接性圈群”。

## 2. 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社交圈群特征

教育和收入是衡量社会经济地位最常用的指标,也是数字不平等研究中的关键变量(Blank & Lutz, 2016)。<sup>⑨</sup>根据教育和收入两个变量,通过因子分析生成青年“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将生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从低到高划分为10组;处于第1组的青年社会经济地位最低,处于第10组的青年社会经济地位最高。

为分析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将三种圈群特征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占比差异进行汇总,通过堆积柱状图(见图2)的形式

呈现。

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青年网络社交圈群“丰富型”占比不断凸显(由5.0%提高到31.8%),“独立型”占比逐渐降低(由44.7%降低到18.7%),“常规型”占比变化不大。这表明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存在差异;青年社会“连接”的丰富性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提升;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的圈层特征更有可能属于“丰富型”。

## (二) 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

### 1. 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为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AIPW模型进行实证估计。表2报告了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其政治参与影响的平均因果效应。

在政策参与方面,拓展“桥接性”圈群连接是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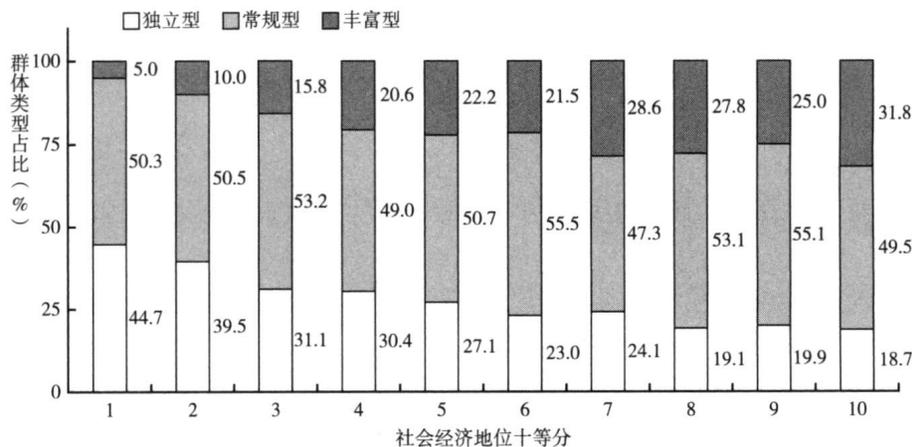


图2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的分布

表2 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

变量	政策参与	表达参与	维权参与
常规型 vs. 独立型	-0.007 (0.011)	0.023* (0.010)	-0.004 (0.006)
丰富型 vs. 独立型	0.058** (0.017)	0.066*** (0.015)	0.006 (0.007)
丰富型 vs. 常规型	0.065*** (0.015)	0.043** (0.014)	0.010 (0.007)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 括号内为标准误; “vs.”后面的类型为对照组。

升青年政策参与程度的关键。从表2中可以看出,与网络社交圈层特征主要属于“独立型”和“常规型”的青年相比,“丰富型”青年的政策参与程度更高(比“独立型”青年、“常规型”青年分别高出5.8%、6.5%);对网络社交圈层特征主要属于“独立型”和“常规型”的青年来说,他们在政策参与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丰富型圈层特征的最大特点在于其丰富的“桥接性”连接,能够带来更丰富的信息和更广泛的交流,因此更有利于提升政策参与程度。

在表达参与方面,青年参与程度随着圈子“连接”广度的拓宽而提高。与网络社交圈层特征主要属于“独立型”和“常规型”的青年相比,“丰富型”青年的表达参与程度更高(比“独立型”青年、“常规型”青年分别高出6.6%、4.3%);“常规型”青年的表达参与比“独立型”青年显著高出2.3%。表达参与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独立型、常规型、丰富型。圈群“连接”带来了新的信息资源,同时网络圈群本身就是表达参与的重要空间。随着圈群丰富性的提升,青年的表达参与程度也随之提升。

在维权参与方面,三类网络社交圈层特征的青年间在平均意义上没有显著差异(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那么,平均意义上的不显著是否表明,该

效应在所有子样本中均不显著?本研究将通过异质性分析对该结果进行验证。

## 2. 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政治参与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具有较强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年网络社交的圈层类型越可能属于“丰富型”,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积极。

通过AIPW模型,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分析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异质性。如果实证结果只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青年中显著,则表明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符合“条件强化论”的观点;如果在所有样本中均具有显著性,则表明不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如何,网络社交圈群对青年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支持“正向促进论”的观点。

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对样本进行排序。将排序处于后75%的青年记为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低SES组, N=490);排序处于25%—75%的青年记为中社会经济地位组(中SES组, N=962);排序处于前25%的青年记为高经济地位组(高SES组, N=530)。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三个方面的政治参与中,

表3 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政策参与	表达参与	维权参与
低社会经济地位组			
常规型 vs. 独立型	0.020 (0.020)	0.015 (0.014)	-0.018 (0.013)
丰富型 vs. 独立型	0.140** (0.021)	0.034 (0.025)	-0.040*** (0.010)
丰富型 vs. 常规型	0.119** (0.040)	0.020 (0.025)	-0.022** (0.007)
中社会经济地位组			
常规型 vs. 独立型	-0.020 (0.016)	0.029+ (0.015)	0.002 (0.009)
丰富型 vs. 独立型	0.045* (0.021)	0.064** (0.019)	0.005 (0.011)
丰富型 vs. 常规型	0.065** (0.019)	0.035+ (0.018)	0.003 (0.010)
高社会经济地位组			
常规型 vs. 独立型	-0.004 (0.023)	0.003 (0.024)	0.001 (0.009)
丰富型 vs. 独立型	0.037 (0.029)	0.097** (0.031)	0.057** (0.018)
丰富型 vs. 常规型	0.042+ (0.024)	0.095*** (0.027)	0.057*** (0.016)

注: +<0.1, \*p<0.05, \*\*p<0.01, \*\*\*p<0.001;括号内为标准误;“vs.”后面的类型为对照组。

网络社交圈群特征、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政治参与三者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关系。

在政策参与方面,不论处于何种社会经济地位,“丰富型”网络社交圈层特征均对青年的政策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显著性上看,在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中,网络社交圈层特征为“丰富型”的青年比“常规型”和“独立型”青年的政策参与程度更高;“常规型”和“独立型”青年在政策参与程度方面的差异不显著。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中,“丰富型”青年的政策参与程度显著高于“常规型”青年,其他类型间的差异不显著。

总体上看,不论社会经济地位高低如何,“丰富型”青年的政策参与程度均较高,其“赋权效应”在中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表明,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政策参与的影响不受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拓展网络圈群更有利于中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的政策参与。因此,网络圈群特征对政策参与的影响更符合“正向促进论”的观点。

在表达参与方面,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表达参与的“赋权效应”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而增强。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中,网络社交圈层特征青年的表达参与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中社会经济地位组中,青年表达参与从高到低依次为丰富型、常规型、独立型;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中,网络社交圈层类型为“丰富型”青年的表达参与显著高于“常规型”青年和“独立型”青年。

这表明,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表达参与的影响只在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中显著。究其原因,表达参与对数字素养与技能要求更高,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受此限制可能无法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由此可以看出,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表达参与的影响更符合“条件强化论”的观点。

在维权参与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网络社交圈群特征对维权参与的影响呈“两级分化”现象。其中,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中,“丰富型”青年的维权参与程度最低;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中,“丰富型”青年维权参与程度最高;在中社会经济地位组中,不同网络社交圈层特征的青年在维权参与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网络圈群化社交促使青年的价值观产生分化。与政策参与和表达参与相比,维权参与需要较高的主动性、策略性和时间成本,并存在结果的不确定性。由于是制度外的参与方式,甚至有时充满较大风险,因此需要考虑参与主体对参与行为的主观看法与感知。

在当今社会,青年“接入”互联网的门槛很低,但阶层差异会带来“信息区隔”,进而在虚拟空间中形成不同的数字场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下,同种类型圈群中的信息内容和质量也会有所区别。因此,价值观差异在虚拟空间中得到延续,高社会经济地位青年会因自我表达需要而提升维权参与,反之,低社会经济地位青年有可能选择规避维权参与,而中社会经济地位青年由于政治取向的多面性而导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本研究表明,网络社交圈群对维权参与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同样符合“条件强化论”的观点。

#### 四、结论与讨论

既有关于互联网与政治参与间关系的研究大都偏重媒介技术特征的视角,忽略了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基于2021年CSS的相关数据,本研究深入分析青年社交网络的圈群特征及其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作用。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中国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独立型、常规型和丰富型。其中,“独立型”主要表现为圈群参与度较低,“粘合性连接”和“桥接性连接”均较弱;“常规型”主要表现为圈群参与度居中,“粘合性连接”较强,“桥接性连接”较弱;“丰富型”主要表现为圈群参与度较高,“黏合性连接”和“强桥接性连接”均较强。此外,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呈现出显著的“层化结构”。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青年来说,网络社交的圈层特征以“独立型”和“常规型”为主;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丰富型”圈群特征占比也随之升高。

第二,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对其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在政策参与方面,“丰富型”青年政策参与程度较高;在表达参与方面,参与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丰富型、常规型、独立型;在维权参与方面,

圈群特征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青年网络社交的圈群特征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存在结构异质性。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政策参与方面,“丰富型”圈群特征对政策参与的影响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组中均显著为正。在表达参与方面,圈群特征的影响只在中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中显著,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中不显著。圈群特征对维权参与的影响表现出“两级分化”的趋势: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组中,“丰富型”圈层特征对维权参与的影响显著为负;在高社会经济地位组中,“丰富型”圈层特征对维权参与的影响显著为正。

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在网络世界中最活跃的青年群体,仍会因社会阶层而呈现出显著的圈群特征差异。这一现象实质上是社会不平等通过数字技术向网络空间延伸的新表现。尽管互联网的“接入沟”与“使用沟”可以借助技术普及与政策干预而被弥合,但难以改变使用者的现实社会结构特征对其网络社交的“锚定效应”。网络“圈层化”是现实社会中不平等的结果;同时,在网络空间中作为数字不平等的起点,会进一步放大大人与人之间的“层化”特征,进而对政治社会行为带来复杂多变的影响。从这方面看,青年的政治参与行为只不过是这一复杂图景中的局部现象。

此外,本研究还对“条件强化论”的观点进行了有效的补充拓展,围绕不同圈群特征和不同参与方式,深入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特征下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总体而言,更广泛的“连接”能带来更高参与程度,但这种影响因参与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限于数据,没有分析青年网络社交圈群内部的互动状况(如互动强度、关系属性、事件类别等),而这对研究青年网络社交行为特征非常必要;其次,对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与政治参与的因果关系进行了细致考察,但对其中影响机制的分析还不充分;最后,本研究在异质性分析上结合既有理论文献主要考虑了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可能引发网络社交圈群结构“层”化的变量因素,需要通过未来研究来进一步厘清与证实。

#### 注释:

①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0月25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5721685.htm>),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8月22日。

②中国移动研究院,2022,《数字青年新消费洞察报告》,8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m04dXMziSC0SxdmB0SfozQ>),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8月22日。

③上文对这三种观点已有所提及,此处进一步讨论。

④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4月13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17-04/13/content5185555.htm#1>),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8月22日。

⑤通过因子分析生成参与指数,这是更常见的做法。在本研究中,因子分析结果的累计贡献率只有39.10%,表明该结果会损失大量原始信息。在不损失大量有效信息的前提下,项目反应理论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估计青年的政治参与概率,已获得较为广泛的应用(王薪喜、孟天广,2021)。

⑥根据既有研究,在潜在类别模型中,AIC值和BIC值是判断模型拟合效果的有效参考标准;数值越小,表示拟合效果越好。本研究比较分类数目分别在2—5时模型的AIC值和BIC值。结果发现,当分类数目由2到3时,AIC值和BIC值显著下降;当分类数目分别为4和5时,模型未能成功拟合。由此确定3是本研究最适合的分类数目。

⑦本研究预先通过MLogit模型进行青年网络社交圈群特征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和收入是仅有的通过显著性检验的社会经济变量。

#### 参考文献:

[1]陈华珊,2015,《虚拟社区是否增进社区在线参与?——一个基于日常观测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案例》,《社会》第5期。

[2]陈云松,2013,《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CGSS2006的工具变量分析》,《社会》第5期。

[3]胡荣,2008,《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第5期。

[4]金桥,2012,《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5]匡文波,2020,《自媒体时代圈群文化新特征》,《人民论

坛》第Z2期。

[6]李彪,2013,《不同社会化媒体圈群结构特征研究——以新浪姚晨微博、草根微博和人人网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

[7]林奇富、殷昊,2020,《娱乐与政治:受众娱乐偏好对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2017的分析》,《政治学研究》第5期。

[8]孟利艳,2022,《社交媒体娱乐使用与青年线下政治参与——基于对河南省18个地市的调查》,《青年研究》第4期。

[9]彭兰,2019,《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编辑之友》第11期。

——,2020a,《网络社会的层级化:现实阶层与虚拟层级的交织》,《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3期。

——,2020b,《“液态”“半液态”“气态”:网络共同体的“三态”》,《国际新闻界》第10期。

[10]田丰,2020,《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反思与对策——以抗击疫情的“饭圈女孩”为例》,《青年探索》第2期。

[11]王薪喜、孟天广,2021,《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基于介入方式与信息消费的类型学分析》,《社会》第1期。

[12]王阳、张攀,2018,《个体化存在与圈群化生活: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与圈群现象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13]王友良,2022,《网络社会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建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14]阎国华、闫晨,2021,《网络圈群栖居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中国青年社会科学》第2期。

[15]张文宏,2011,《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16]郑永年,2014,《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17]Baumgartner, Joly C. & Jonathan S. Morris 2010, "My Facetube Politics: Social Networking Web Sites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Young Adult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8(1).

[18]Blank, Grant & Christoph Lutz 2016, "Benefits and Harms from Internet Use: A Differentiated Analysis of Great Britain." *New Media & Society* 20(2).

[19]Brundidge, Jennifer 2010, "Encountering 'Difference' in the Contemporary Public Sphere: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et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Network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0(4).

[20]Campbell, David E. 2009, "Civic Engagement and Educa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Sorting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3(4).

[21]Gentzkow, Matthew 2006, "Television and Voter Turnou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1(3).

[22]Hargittai, Eszter & Amanda Hinnant 2008, "Digital Inequality: Differences in Young Adults' Use of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5).

[23]Putnam, Robert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24]Scherer, Christian, Phillip K. Masur, Stefan Geiß, Phillip Müller & Svenias Schäfer 2021, "The Impact of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Use on Well-Being: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Adolescents across Nine Yea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6(1).

[25]Schlozman, Kay, Sidney Verba & Henry E. Brady 2010, "Weapon of the Strong? Participatory Inequality and the Interne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8(2).

[26]Tolbert, Caroline J. & Ramona S. Mcneal 2003, "Unraveling the Effects of the Internet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6(2).

[27]Wellman, Barry 2018,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London: Routledge.